

回 忆 鲁 迅

冯 雪 峰 著



回 忆 鲁 迅

冯 雪 峰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北 京

出版说明

本书初版于一九五二年八月；一九五六年末，曾由作者作了大量的删节，一九五七年六月重排出版。

这次我们据作者的手改本与重排本进行了核校，觉得初版本内容较为丰富，因此除了属于修辞或误记的订正依手改本外，都恢复了初版本的原貌。另外补入有关的文章四篇列为附录。

书中原有作者自加的注释，编者所加的均署明编者注。

回忆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2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frac{9}{16}$ 插页 2

1952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2版

1981年7月湖北第6次印刷

印数 114,001—122,000

书号 10019·107

定价 0.51 元

目 次

一九二九年

- 一 我怎样去见鲁迅先生1
- 二 触到他自己的谈话片断9
- 三 触到他自己的谈话片断之二18
- 四 我对于他的思想方法和他的天才的
特征的一二理解28

“左联”时期

- 一 鲁迅先生对“左联”的态度42
- 二 这时期所表现的思想毅力54
- 三 这时期所表现的思想毅力之二63
- 四 关于他和群众的联系73
- 五 民族的感情和阶级的感情85
- 六 关于他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103

一九三六年

- 一 在病中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他的情绪120

二	在病中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他的情绪之二·····	130
三	思想上又有新的发展的征象·····	143
四	思想上又有新的发展的征象之二·····	152
五	逝世·····	161

附 录

党给鲁迅以力量·····	170
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	182
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	193
鲜血记录的历史第一页·····	199

一九二九年

一 我怎样去见鲁迅先生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柔石带我去见了鲁迅先生，从此我就跟鲁迅先生接近，一直到他逝世之日为止。

我去见鲁迅先生，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从柔石谈到鲁迅先生的话里，觉得鲁迅先生是很好接近的，他是真正肯帮助青年的。另一个原因，也就是我去见他的主要目的，是我那时候正在从日本文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品，碰到的疑难，没有地方可以求教，知道鲁迅先生也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工作，所根据的也是日本文译本，所以我去见他，是想请他指教，并且同他商量编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丛书^①。

柔石，是一九二二年前后我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候的同学，同时他和我都是那时候杭州晨光社（青年文学团体）的社员，在学校里是他比我高三个年级，可是我们差不多同时离校，因为我在一年级就停学了。以后就只有两度很短的时间在一起过；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我在家乡一个中学

① 即《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预定出十多本一套，后因国民党反动政府禁止，只出版过八本。鲁迅先生翻译的《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文艺与批评》（卢那卡爾斯基著）、《文艺政策》都曾经编入。

教书，因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在十一月间到了上海，他先知道了我的住址，就先来找我了。

他快乐而平静地告诉我：他同几个朋友弄了一个朝花社，鲁迅先生也是同人之一，想出丛书和画册，介绍欧洲的文学和版画。他们就住在鲁迅先生的隔壁。——他谈得很多，大都关于鲁迅先生的事情，而对于鲁迅先生对青年的诚挚恳切的态度，以及他对柔石本人的帮助等等，还说得特别认真，好象要对我证明似的。

柔石并且告诉我，鲁迅先生也曾经谈到过我的。因为我译过苏联的《文艺政策》一本书，那时候已经出版，鲁迅先生也在译它，在《奔流》上面连载，他说，就从这件事情谈到的。他又说，鲁迅先生也提到过我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翻译过日本昇曙梦著述的关于苏联的文学、演剧、跳舞等三种小册子的事情，认为这种介绍对中国文艺界是有好处的。

过了几天，柔石又来看我了，带来了一本日本文译本的关于辩证法的小册子，我已经忘记了原作者的名字，他说这是鲁迅先生送给我的，还复述了鲁迅先生对他说的话道：“我买重复了一本，去退还内山书店也麻烦，你带去送你那个同学去罢，省得他再买了。”

这一天，柔石谈得更多，其中曾经谈到了同创造社论战时候的鲁迅先生的心情。据柔石说，鲁迅先生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了。于是，柔石也把鲁迅先生看了我的一篇文章之后曾经很反感的事情告诉了我。那是在半年多以前，我在一个名叫《无轨列车》的杂志上面

发表过一篇题名《革命与知识阶级》的文章，也是关于一九二八年初创造社和鲁迅先生的论争的；柔石说，鲁迅先生看到了，当初很反感，说道：“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不过，柔石接着又说，他自己的看法并不如此，他对鲁迅先生解释过，认为我的文章的主旨是在批评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因此，鲁迅先生以后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柔石还谈了一些别的，我都不详记了。

他的两次谈话，虽然始终谈得很平静，好象谈家常一样，却使我很感激鲁迅先生，并且很冲动，想马上就去见他。

说到这里，我还想再叙述一点在我感激的心情里面含着非常惭愧的情感，以及我怎样开始改变过去对鲁迅先生性格上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这类事情。

例如柔石提到鲁迅先生曾经很反感我那篇文章，我当时听到是感到非常惭愧的。我觉得鲁迅先生的反感完全不是由于他的私心，而恰恰是他看穿了我的肤浅和轻浮；这肤浅和轻浮，我那时已经感觉到了。其实，那篇东西发表后不久，我就感到了其中的错误，尤其讨厌在语气上所表现的我那种“象煞有介事”的轻浮的态度。后来我因为要选鲁迅先生在北京时所写的作品做教材，又曾经比以前更细心地重读了《呐喊》、《坟》、《热风》和《华盖集》等，觉得我过去的理解不但浅薄，而且武断；同时也开始有些觉得，我是很受了某些机械论者的文艺观点的影响的。

我翻译过苏联的《文艺政策》，我很受这本书的影响。

举例说，其中有对于宗派主义的正确的批评，因此我就有根据，敢于指出那时创造社的相类似的宗派主义的存在，这是我受的好的影响。但其中也收录了讨论文艺政策的会议的发言记录，在发言记录中就有几个机械论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不少言论，我也同样受了影响了，例如我也机械地把鲁迅先生派定为所谓“同路人”，就是受的当时苏联几个机械论者的理论的影响。这几个机械论者后来在苏联是被批判和清算了，可是他们就曾经对高尔基有过轻率和错误的认识，也曾经把高尔基看成为“同路人”的。

我重读了鲁迅先生的几种作品之后，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机械论的错误，但也已经觉得在那篇文章中我完全没有认识鲁迅先生的战斗与工作的巨大的革命意义，这是我的错误的主要所在。所以，我已经开始明白我那文章虽然批评了创造社，并且替鲁迅先生辩护，然而我只是消极地辩护，却并没有真的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于是也没有认识鲁迅先生对革命的作用。我的错误在基本上是和那时创造社相同的，因为那时创造社打击鲁迅先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没有认识鲁迅先生的革命意义。不同的，只在于创造社是攻击鲁迅先生，说他“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我则替鲁迅先生辩护，说他只是不革命，但对革命却是无害的，而创造社攻击他，这是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如此而已。我并没有明确地承认鲁迅先生对于革命的积极作用和价值，同时也没有提出应该如何团结他的建议。

加以我已经自觉到我那篇文章在态度上的轻浮，所以

当听到柔石说到鲁迅先生的反感的时候，我确实感到惭愧。可是，因此，我的感激也就加倍了。我想，这对于我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将使我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上能够诚实和虚心起来的。

其次，我也就开始改正我过去对鲁迅先生性格上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明白地说，由于我自己的一些片面的印象和主观的偏见，我以前是并没有应有地尊敬鲁迅先生的。我从前在北京时凭我自己的片面的印象所构成的鲁迅先生的性格，就和柔石所说的很不相同。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之间，我在北京过那时所谓的流浪生活，曾经走进北京大学的教室听过几次鲁迅先生的讲课。我得了一些印象，又从别人那里听来了一些，我判断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在心里曾经这样地说他：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得可怕呵！我看见他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一切旧势力和一切权威，并且自己就愿意先为青年斩除荆棘，受了一切创伤也不灰心；可是我觉得他又好象蔑视一切，对一切人都怀有疑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敌人似的。总之，我以为他是很矛盾的，同时也认为他是很难接近的人。虽然那时我和未名社的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等都很接近，也常常听他们谈鲁迅先生，并且知道他们直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导，他们对他们的帮助是很大和非常真诚的，但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我主观上所以这样地理解鲁迅先生的性格，除了根据

片面的印象之外，也还由于读了他陆续发表的散文诗（就是后来收到《野草》中的）的缘故。但现在分析起来，主要的还是因为我还不能从社会的观点去分析和理解他的思想与作品的缘故。

我那时认为李大钊同志才是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虽然我那时候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受了李大钊同志的殉难的刺激，才加入共产党的。我也从没有见到过李大钊同志，只读过他在《新青年》上面发表的几篇论文和一首小诗，听说过关于他的革命活动和他做人的一些传说。可是，我非常相信他的淡泊是真的淡泊；同时，我觉得他的朴实的文章的力量以及关于他的人格的传说，就都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信念的最真实的证明。我那时开始觉得，做这样的人才是我们青年的道路；同时就开始读一些社会科学的书。后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同志和别的一批革命者被张作霖杀害了，第二天报上看见，我的脑子曾经有一两分钟好象失去了感觉，有两三天我好象失去了魂魄似地没有一点主意。这个刺激，对我有最大的影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认为李大钊同志是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这个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并没有进一步地去学习李大钊同志和其他真的共产主义者，却自以为已经懂得了一些，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就只因为自己崇拜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读过几本社会科学的书。这不但是我的幼稚可笑，而且显出了我的不学无术的不虚心的

很坏的一面，这一面就妨碍我学得更多一点，懂得更多一点，到现在我都还要时时跟自己的这一面斗争的。我的这种幼稚和不虚心，也就是我以前没有应有地尊敬鲁迅先生的原因。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以前没有给鲁迅先生以应有的尊敬，或者没有把他跟李大钊同志一样地来崇拜，我就应该受自己大大的责备。我不是这个意思，同时也是不必要的。我只是说明我以前对鲁迅先生的看法，后来觉得不正确了，并且分析了所以不正确的原因。至于自己的主观和不虚心，那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应该受责备的，决不是只因对某一个人不虚心才应该受责备的。

现在，柔石平静地向我描述出来的鲁迅先生，把我过去的偏见纠正过来了。

柔石的朴实和忠厚的性格，以及他在鲁迅先生对他的友谊和爱里面所表现的自然与纯真，也是我什么时候一想起，都栩栩如生，好象就在眼前一样的。

我那时感觉到，现在也同样感觉到：在柔石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简直就是他的一个慈爱的塾师，或甚至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却并非一个伟大的人物，而鲁迅先生也是象一个父亲似地对待他的。

其实，也不只对柔石一个人，鲁迅先生对一切好的青年都不自觉地流露着“父爱”的感情的，这一点，一切同他接近过的青年都能够证明。

因此，我那时觉得，现在也同样觉得，柔石在我还没有

请他介绍之前就约我去见鲁迅先生，也就好象约自己的一个朋友去见他的塾师或见他的父母一样。我想，正是柔石的介绍，使我很快就能够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和取得他的友谊了。

在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去见他，就是带了书去求教的。我记得带了一本日本杂志去，其中有德国蔡特金或别的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的译文，有几处附有德文原文，我看不懂，因为鲁迅先生懂德文，我就去问他了。同时也带了我正在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译本去，问了几个我疑惑的地方。

的确，鲁迅先生的习惯，对于初见面的人，话是极少的。我记得，柔石把我带去了以后，他自己有事就先走了，鲁迅先生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之外，就简直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局促，也很快就告辞了。第二次去见他，话仍然不多，虽然我已经提出请他翻译普列汉诺夫的几篇关于艺术起源的通信体的论文，编在我在发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第一本的意思，而他也当即答应了。但是，以后他的谈话就一次比一次多了。

大概过了两个月，柔石替我在他附近找到了房子，于是到鲁迅先生那里去的次数也多起来，谈的话也更多，常常谈一两个钟头以至三四个钟头，大都在晚上。

下面我想把谈话的情形，就能够记得的，叙述一些。

二 触到他自己的谈话片断

那时候，往往到十二时以至十二时以后的很多晚上的谈话，几乎每一次都触到了鲁迅先生自己的思想情况的；我现在还记得一些的也大半属于这一部分。

这种谈话，总是由两种情形引起来的，或者由于他从他正在翻译的论文或正在阅读的书中有所收获，就高兴地谈起来，于是谈到了他自己过去的见解和现在的感想。那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关于文艺的论文和社会科学的书籍，都是日本文译本，当时日本介绍得很多，而上海都能买到。那种时候，常常是我一去，让我坐下，就愉快地说起他译了什么作品或看了什么书，而后紧接着说：“实在得益非浅！”于是就谈下去。在这种时候，他真的非常健谈，而且显得快乐、年青，时常夹着他那爽朗的出声的笑。谈话自然都是没有系统的，往往一拉就拉到前后全不相关的什么事情上面去，非常随意，就是所谓闲谈；而在这种闲谈中间，同时也就不知不觉地会谈到了他自己。

或者由于别人批评到他，他就谈起自己来。对于别人的批评，根据我的印象，有的时候他不能不说是没有“牢骚”的。但当然，不用说，如果那“批评”是来自各个反动派方面

的，不外说他“尖酸刻薄”或诬蔑他“拿卢布”之类，那他是决不会有“牢骚”的。平常总是提到了什么人或什么刊物又是怎么说怎么说之后，照例眉头一皱或脸一沉，表示了他的憎恶，就不再谈下去了；有时，是很高兴似地大笑起来，他觉得敌人对他的诬蔑，是由于他攻击了敌人，敌人受了伤、感到了痛的缘故。我顺便提到，在我看来，鲁迅先生在谈话时所表现的对敌人的蔑视，要比他在文字上所表现的来得更厉害。我想，这大概由于在文字上，他面对着的是整个旧社会，他是把个别的具体的反动分子及其行为思想，跟旧势力、反动势力联在一起去看的，所以他的观察就更全面，他的分析更深刻、尖锐和彻底，他的胸怀和气概也更开阔和雄壮；在这样的时候，他也就不能不觉得任何个别的反动分子及其思想行为都是有势力的，都不能不把他们当作有强固力量的旧势力来看的，于是他的思想里面总处处有着教人“韧战”的暗示，他的对敌人憎恶而对人民满腔热情的感情里面也多少要反映着他对社会的不满的情绪。当然，这种对社会的不满的情绪，决不是他对敌人的示弱；可是，在闲谈的时候，鲁迅先生就好象暂时从社会的压力之下解放出来似的，精神上似乎就要轻松和快乐得多，同时他提到某些反动分子，也往往把他们当作个别的存在来看了。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把他们当作个别的存在来看，那他们不但要显得更卑劣，并且也要显得更无能，更不足道的，所以鲁迅先生对他们的蔑视也就更甚了。我常常感觉到：当闲谈时，提到某一反动分子或某一反动派的小喽罗，鲁迅先生不过

把他们当作没出息的东西加以讥笑，一句话就了结了他们了；但是，在文章里面写到这类人物的时候，他可就把他们挖得深，简直把他们当大敌人看待啦。

总之，鲁迅先生是并不轻敌的，即使敌人很渺小；而听到敌人对他的诬蔑，他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牢骚”。

只有属于进步方面的人，尤其青年，对他也有不正确或不合事实的批评的时候，他才一提起就有一些可说是“牢骚”的话。而最使他不快，提起来就甚至使他愤怒的，是青年或算作进步的人里面也有莫名其妙地说他“尖酸刻薄”，或说他“投降革命”，好象跟敌人同一个鼻孔出气似的糊涂人。

但虽然不愉快，他也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的，这种时候也就往往很自然地谈起了他自己来。

根据我跟他七八年的接触所得的印象，鲁迅先生不能说是喜欢谈他自己的人。但这时候，他确实喜欢谈到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喜欢谈到他的某些见解由于怎样的感触和教训而有了改变的事情。我觉得，那些谈话，不管怎样引起来的，在当时的他还似乎是一种要求，好象他很有些东西要自由抒发，要消除心中一些郁积似的。谈话，有时是有柔石在一起的，有时是只有我一个人，比较起来，触到他思想情况的谈话是跟我谈的要多一些。那时候，他对柔石要比对我更亲密一些，只因为我那时喜欢提到社会意识和文艺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正是他那时候所喜欢谈的，所以就跟我谈得多一些，并且也更容易联系到他自己的思想情况了。

但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革

命，大屠杀革命人民，对他的刺激是特别深刻的。他目睹黑暗的血腥统治又在笼罩着中国。一方面，他也看见共产党在坚决地继续领导着人民，使革命深入地发展；他自己又已经认真地研究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时候，据我看来，对他自己来说，他就正好处在对自己过去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的、向前发展的自我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间。现在我们都说，鲁迅先生在后期思想上向科学的共产主义的伟大跃进，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而在一九二九年，我觉得也还在这个开始的过程中间，还在向前发展所必经的自我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间。因此，我以为他那时候的谈话往往要触到他自己的思想情况，也就是他的自我思想斗争的反映之一。

例如，由于那时（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列宁青年》^①上面一篇评论当时文艺界的文章而引起的不止一次的谈话，就都曾经触到了他的思想信念以及关于他的创作《彷徨》和《野草》里面的感情等问题，对他自己有过极深刻的分析的。

那篇文章，把当时文坛分为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三派，其中批评到了鲁迅先生，举他的散文诗集《野草》里面《影的告别》一首散文小诗做例证，指责他的“悲观”和“虚无”。在鲁迅先生谈起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他告诉我时，开头是有点感慨的：

“他们仍旧太不留心黑暗势力。……将文艺界现状分为三派：创造社派，革命文学；语丝派，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新

① 《列宁青年》——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公开的机关刊物。